



启蒙论

社会学与中国文化启蒙

On Enlightenment:
Sociology and Chinese Enlightenment

陈海文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启蒙论

社会学与中国文化启蒙

陈海文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启蒙论: 社会学与中国文化启蒙 / 陈海文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 - 7 - 5097 - 1652 - 6

I. ①启… II. ①陈… III. ①启蒙运动 - 文化史 - 研究 - 中国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6970 号

启蒙论

——社会学与中国文化启蒙

著 者 / 陈海文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经理 / 童根兴

责任编辑 / 王 玮 王 绯

责任校对 / 张丽萍 夏乘风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宝蕾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38.75

字 数 / 656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652 - 6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0 - 4986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金耀基

陈海文教授告诉我，他的《启蒙论》手稿已杀青时，我是着实为他高兴，也松了口气的。他说此书之作，从动笔以至出版，已用去整整五年工夫。事实上，他写此书之动念，至少已是七八年前之事。海文是一位好于思、乐于思，并深于思之社会学者，在目前学术界重时效，讲求论文式出版的年代，他却埋首于长线研究，并致力于一部多达六十万言的著作，不能不说是个异数。海文这本《启蒙论》充分显示他是有抱持、有信念、有所为而为之的。

海文之所以有《启蒙论》之作，起源于他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运命与困境的关怀，他对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考是以中国文化启蒙问题作析疑辩难的入手点。他不满中国文化启蒙运动以及中国启蒙论述中出现的启蒙之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乃至迷思化，在他看来，这都偏离甚或背弃了启蒙课题应有的旨趣与理念。用他的话说，“对中国文化启蒙之追求与疏解，核心在于能否摆脱意识形态化的桎梏”。《启蒙论》以“社会学与中国文化启蒙”为副题，盖其落墨最多的是“借社会学论述以重新检视中国启蒙的理念与现实”，“借社会学理论构成以超越历史认识的局限”，“而关键系于对启蒙之理论课题的安立与掌握”。海文在启蒙的论述中，对于启蒙的“课题”（problematics），再三致意，在他而言，对启蒙“课题”的廓清，是正本寻源的工作。

著者用近三百页的篇幅，以“理念型”的建构诠释启蒙理念的核心价值、取向与界线，以启蒙的“类型学”来破解启蒙的心态。在这里，著者展现了细致的论述，他的“道德—理性”、“道德—非理性”、“非道德—理性”与“非道德—非理性”的四个向度的建构，别具构思，诚有助于对启蒙历史—社会运动之疏解与检视，其“理念型”“类型学”的研究，意在还原“启蒙课题”之面貌，更意在为检视中国启蒙事业安设一个理论的视角：值得一提的是，海文这样的工作，着意于超越摆脱“西方中心”的启蒙视野，在启蒙普遍意义的理念框架中，寻求中国文化启蒙事业特有之路的开展。

著者的“中间考察：中国启蒙事业”一章是全书一个中介式的转接，一方面将启蒙课题的论述接进中国历史文化脉络，以探求中国启蒙之取径，另一方面，则展开启蒙与社会学论述的内在联系，以探求启蒙与社会的合一，并借启蒙景观以求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世界）秩序之建立。在海文看，这样方始是启蒙课题之最后完成。在此章中，著者在对中国启蒙运动（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程作批判性回顾之余，即集中探讨新儒家式对启蒙事业的学思进路与本土建构。著者认为，“中国启蒙之路仍须安立于中国文化以为主体”，并且以新儒家所说的“圆而神”定中国文化之精神，以“三极”定中国文化之本体。在这样的认知下，除了以这样定义的中国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启蒙外，余皆不足以言中国启蒙，从而五四或五四之前之后的种种文化运动与思想论述，鲜有在著者视野之内。任何一种强度的理论视角，都会有所见与有所不见，陈海文教授基于这样的理论视角的论述，在他几乎是一种志业之操持，至于所持之论见会否引起学术圈或读者之共鸣、会心或对话，进而对启蒙课题，特别是中国启蒙课题，有进一步之开展，则恐非他所应计及。

循著者之理路，中国文化启蒙的实践落实，不但未能有所突破，反而有朝向两极化的危险，即“运动”与“学思”的两极对立，“学术”与“价值”之两极对立，而出现了他所称的“文化取向上的犹豫与无所适从的困局”。陈海文教授认为要克服这困局，有必要从阐明社会学——及社会学理论——对启蒙论述之意含，以为中国社会提出另一启蒙之几。在这里，他有一强度的宣称，他说：“反观从晚清迄今的中国启蒙事业，其中的善意与热诚容或无可置疑，但困局仍在于缺乏能相应的论述与方法，难以展开相关的文化事业”，又说“启蒙课题及事业亦只能是社会学式的关怀”。著者之所以有如此的宣称，乃是他认为启蒙在社会落实必“涉及社会构成本身之蜕变”，而“启蒙课题的极致便是启蒙与社会之交织——启蒙之社会学——的整体课题”。他的立意所在，无非说只有借社会学理论的论述作为中介，始能有相应的论述与方法将启蒙课题接上并开展中国的文化启蒙事业。他在书的第三部〈后设社会学〉及第四部〈社会本体论〉，用了三百五十页的篇幅，走二步，退一步，迂回环复地企图所展现者即是对启蒙之“社会学式的关怀”，应指出者，为了证立对启蒙课题及事业“只能是社会学式之关怀”这个命题，他不啻要为社会学重新定性，事实上，他从“后设社会学”的理论位置，以及“后现代性”社会学观点，批判了时下主流实证社会学（重工具理性）之偏离古典社会

学与背弃启蒙主题，他更从“社会学中国化”之讨论转向中国社会学论述之重建，这一切在在可见著者对社会学之理念与实践的深刻反思及其独特的思想格调。至于本书社会本体论范畴之论述，千言万语，期在证立社会轶域（社会之再认），神圣轶域（社会之神圣性），及文化轶域（中国文化之神圣性）之各有自主与彼此融连，著者亟亟于展示在中国文化脉络中，神圣、道德、文化三者之相互扣连，他的用心要在构建中国文化的本原面貌，强调中国之文化启蒙应有可有其自己的“向上之路”与景观。海文的缜密深致的阐释，不论同意与否，不时有令我击节称赏的地方，其中论中国文化之构成，以“世俗—神圣”的论析脉络，从“以世俗为神圣”（Fingarette 语）转到“以神圣为世俗”的演绎，为“天人合一”作了社会学式的当代诠释，无疑是极富创意的笔法。

陈海文教授之作《启蒙论》，自言其命意是求对中国文化启蒙的探讨重新提上议程。如他所说，这是“为对治文化启蒙诉求的边缘化迷思化而言”。在他看来，近代中国的启蒙诉求，在不同阶段及循不同方向被“压倒”。海文在全书结语时，更有“现代化压倒启蒙”的提法。他说：“中国文化面对另一处境是，对现代化与现代化的论辩及追求亦正在压倒启蒙——现代化压倒启蒙，这是启蒙事业的又一转折。”更有进者，由于现代化议程对启蒙的“吸纳”，使中国文化启蒙论述及追求，已成为现代化讨论的附庸，此则不止是对启蒙课题的“压倒”，甚至“取消”。这也许是著者所以用了如此大气力，企图建立文化启蒙论述与实践空间的自主性与特殊性，并疾言“启蒙是未竟的事业”。海文对中国文化有这样的忧患意识及对中国文化启蒙有如许的抱持与信念，欣赏钦佩之至。但我想指出，现代与启蒙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二者有离有合，非一言可尽，实则，此涉及根本的现代与启蒙之界定，对于“什么是启蒙”的诠释，海文了解，当代的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与福柯（Michel Foucault）二人就有极为歧异的立场，我觉得海文是定义地把文化启蒙与现代课题分开来了。在海文的论述中，启蒙有“犹豫”（ambivalence），有反思性（reflexivity），有多元开展之路向，其实，在“现代性”的论述中，现代亦何尝无“犹豫”，无“反思性”，亦何尝不具有多元性格，如果说启蒙是“未竟的事业”，现代性方案不止如哈贝马斯所言是一未竟的事业，且如科拉科夫斯基（Kolakowski）所说，还是在“On Endless Trial”中，现代课题之展开没有必然，也没有必须“压倒”与“取消”启蒙课题的。

陈海文教授之诉控现代（现代化）“压倒”，甚或“取消”启蒙是“因为中国

现代化的普遍追求与纲领并未能同时面对文化诉求”。无可讳言，中国现代化，历史地，主要是以反省、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姿态进行的，而海文则是认定“传统—抒情”为中国文化母题 (*leitmotif*)，以为必须转向文化母题，返本开新，始有中国文化启蒙的机运，海文遣词用思，一循当代儒者唐君毅先生的理趣与文化情怀，其层层转进的论辩，确可以深化中国的现代化（现代性）的反思。我一向认为一个别于“西方现代性”的中国现代性之建构与创立，讲到底，必不能不有中国传统潜藏的文化资源的掘发与构塑，至于这是否又是“现代”对启蒙的“吸纳”或“压倒”的“自慢”与“霸气”？我不其知，是耶非耶，其惟海文知之。是为序。

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前 言

本书的写作，从动笔以至出版，已用去整整五年工夫，无论是时间或心力的消耗，均非我始料所求——“书本自有其生命”，这恐怕是不少作者的共同感慨。

亦是在五年前的圣诞假期，我开始为自己所尝思考与论及的中国文化题旨求缀合与补充，以求取能较充实完整的认识纲领。然而其用意本来是为与香港的文化心态及发展作对比，以中国及香港的不同文化视野互为对比、观照，各自可为对方提供观察及理解的支点。中国文化建设是在“大传统”层次上的宏观重整，而香港文化的动力，则是着重以生活文化与普及文化为依归，这是在广义的“中国”视域以内的对照，但却可为二者提供外在于一己的参照角度与准绳。这综摄的“中国”文化社会学视野，大抵是我回港任教以来的学思重点，其中所牵涉，一方面固然是颇复杂的理论与观念纠结，但从另一方面看，亦可视为宏观的应用社会学，疏解文化与社会现实连系。这研究纲领的落实，应可有助于厘清无论中国内地或香港的文化处境。

然而在五年前进行的缀合补充工作，一下子演变为庞大的认识与写作诉求，环环相扣的疑问，难以有简捷的答案。我固然从未低估中国文化问题的复杂性，亦是因此而试图借文化启蒙课题以为特定入手点。这阐释策略可以容许较具体的文化论述与焦点的建立，但却须与正面面对启蒙课题自身的理论与历史构成。对这些疑难的回应，我是缘社会学进路以为依归，首先是以之为研究与解析的方法论，其次是以之为具体的思行轨范与社会想象。是在这社会学——从“理念型”以至“社会本体论”——的认识视野，而中国文化问题与启蒙论述可达至一定的契合。这思路层层转进，每一步所要求的印证安立工夫，已是一言难尽。

故此本身置身于目前讲求轻薄短小的出版年代，或可说是异数。但从另一方面说，书中所作的阐述其实仍不过是限于纲领性的探讨。似乎颇大的篇幅，

亦不过是足以作提纲挈领的基本功夫，以为进一步的专题探索作准备。在我而言，全书讨论可再作发挥印证之处极多，但我却只能在阐释框架的安立以后暂行搁笔了。本书的论述体裁与格式，在在指明这作为讨论纲领与框架的性质。

从1996年底至2001年底，这段日子并不平静，香港固然是经历了回归、金融风暴、经济低谷等一连串影响深远的历程，中国与世界更是风云幻变，既有中国在国力与经济上的提升，在申奥与入世的突破，但仍须面对在全球层面恐怖主义霸权主义的泛滥与战争的阴影。在这风险社会式的时代背景下，并不容易取得学术思辩所要求的、隔离的智能。至于就我个人来说，压力亦来自香港学术圈的动荡与紧张；在写作本书的同时，教学须要同时进行自不待言，另外还有各式各样的校内校外的审查评核必须面对。在香港目前的学术圈，行政化和政治化正在大大缩减学思的空间，尤其是不利于长线研究计划与学思纲领。在这意义下，本书的写作已可视作个人的自我纵容，而在这过程中，亦确实每为我安立可息游其中的天地，暂且避开学术与行政相角力的现实。

但无论如何，本书的写作以迄完成，并不能单靠个人的坚持而致，其他大大小小的助缘，均是我应致以谢意的。

我自回港以后，一直寄身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香港学术圈的种种不安，无论中大或社会学系均难免牵涉其中，但在我个人体验而言，中大社会学系应可说是一方净土，亦是我得以安立学思空间的基地——纵使不能毫无代价，但较大程度的问学自由仍能得以保障。就这一点，金耀基教授、李沛良教授、刘兆佳教授等历任系主任，功不可淹。

本书的出版事宜，蒙金耀基教授与张得胜教授建议及襄助良多，我疏于实务，故此尤其感谢二位教授的盛意帮忙。金教授同时为本书作序，我与金教授多年师友，已是不敢言谢，但对加添他副校长岗位上的繁重工作，感到歉疚不已。

本书写作初期，冯惠卿同学曾为我充当研究助理。可以说她亲历本书的发轫成长。冯同学在取得硕士学位后另有发展，而继其任的是何翠欢同学，二位所提供的技术支援与文稿处理，令本书写作过程更为顺利，应特为致谢。

本书的序论章、第一及第二章，初稿曾发表于以下期刊，谨此向各编者致

意：《二十一世纪》双月刊（第26、28期）、《社会理论学报》（一卷一期）。

牛津大学出版社林道群先生，负责出版的具体安排，林先生态度认真而效率极高，应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编辑。

在以上一连串致谢以后，仍有言未尽意之感。我对人际关系并不擅长，假如“书写”真可被视为补赎的话，希望本书亦可算是一点回报。

陈海文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内地版前言

《启蒙论》初版本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在2002年春刊行，不过这是主要在香港发行的繁体字本，虽然牛津大学出版社在内地及台湾均有行销网络，但对内地读者群而言，繁体字本较难流通，而且牛津在内地的发行量亦不算大。可以说除了在有限的社会学者与文化论者圈子，《启蒙论》香港版并未正式进入内地读者视野之内。从这角度说，这次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持刊印的简体字本，虽然严格而言是再版修订本，但事实上却是面对内地读者群的初印本，对作者自己而言，仍是有着若干初版发行时的愉悦之情。

提到这些“书史”上的背景，并不纯是抚今追昔的感慨，而亦是指出本书的一些复杂性。本来预计紧接繁体字本便即筹印的简体字本，最终一再延误，以至于今。造成这些延误，其中一原因自然是因为本书篇幅较大，牛津较难找到可以合作的国内出版社。但更主要的原因毋宁是种种外缘因素——在学术圈内外的各种因素——打乱了原来拟订的出版计划，亦使作者难于专注处理内地版的出版事宜，悬念已非一日。在去年（2009年）夏天，作者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沈原教授邀约，在清华讲授文化社会学，亦是经由沈教授之介，促成是次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合作。沈原教授是热心人，希望我另外欠他的——文化社会学方面的——“文债”亦可早日清偿。

简体字版的《启蒙论》大抵仍以香港初版的内容为准，亦可说是保留了世纪之交时的有关论述水平与文化氛围。我固然亦有考虑趁这次再版进行较大程度的修改，但恐怕旷日持久，在现实上暂时是不可行。而另一方面，繁简体字的转换，最终亦是不同文化圈子与生态的改换，除字体外，不少名词、译名、遣词用字、格式等，均须要作出调适。对一些具体讨论的轻重详略亦要重做斟酌。这些似乎主要是技术上的改动，但最终仍可累积为整体面貌的实质蜕变，与初版风貌已有一定歧异，“形式与灵魂”的互动，在这里亦是大概率可

见。故此虽然说新版本是以初版为准绳，但简体字本的修订并非只限于枝节而已。

不过对是否进行较大程度修订的问题，若回到较核心的学术考虑说，我只能承认在目前而言，我自己是尚未有足够准备就《启蒙论》全书作较深入修订或提升。在简体字本的筹印过程中，我对全书重作推敲，对书中或有的各项优劣再行斟酌。可以这样说，在目前对全书不同方面作改动以至改善并不为难，我在过去数年亦积存不少本书的阅读与思考札记，可以作为修订本的基础。进行这程度的修订主要是时间的问题，修订工作本身难度不高。然而若是从较严格的要求以视对全书的改善提升，则毋宁是意味在学问与认识水平上更求突破，提升本书的整体深度与洞识，对这理想目标的正面追求，我以为目前应未具备充分的条件。这一方面是作者个人学识进步的幅度问题，但另外亦涉及启蒙课题自身的论述水平与定位，关键是二者的交相为用，能否足以撑持更深刻的突破。

若先从较宏观的学术脉络看，对文化启蒙课题的讨论与汲取，尤其是以社会学论述作借径，这仍是当前学术圈中较边缘性的纲领吧。文化性的议题一般不易引发现实上的关注，这倾向即使在学术圈亦然，更何况是似乎陈义过高的文化启蒙课题了。在这一点，对文化启蒙课题的更求突破，可以倚仗一定论述社群以为资源的可能性大抵不高，须要再假以时日以拓展相关的论述社群与水平。至于在较个人的层面，就作者自己而言，真要对启蒙课题的阐新更作提升，所要求的认识上以至体悟上的深度已是大不相同。在《启蒙论》不算短的篇幅，对一些相关问题的处理，可说已是推展至当前文化论述的“极限”——例如社会、文化、神圣等作为本体畛域，例如“以神圣为世俗”的论旨，例如启蒙与觉悟的比对，以至一系列所涉及的理论文化题旨等——无论阐释是否完满，但更作擢升之路已是举步维艰，难于贸然重作推展。在学术路上力争更求突破，这本来便应是学者的常情，但文化启蒙课题所须面对，已并非纯是学术建制领域之事，而是如韦伯式对“生活秩序”自身的最大关注，在这里可有的任何进步或突破，自然均非轻易可致。求拓展生活秩序——在学术上与体验上——的可能性与意义，这无疑正是如上文所指的，“极限”性的诉求。

在目前只可以说，我自己对相关的课题与理念仍在追溯探求中，希望能成

就学问及认识上的突破与扩充，只是在“极限”之外天地间更有何物，抑或只余一空依傍的虚悬与独造，这境界——或心境——并不易先行捕捉与刻画，甚至可以说是全新的体验，其酝酿与成熟尚需一段时间。然而目前香港的学术圈——与西方现代学术圈相类似——大抵世俗化色彩是日重一日，工具性与行政化已成为大学世俗化的主轴，二者交相为用，纠缠不休，亦引发种种功利与权术的考量。所有这些圈内圈外的牵绊，固然可以视之为生活世界不能避免的历练与修业，但要点是世俗化大流的往而不返，恐怕并非当前可改变的现实。

我自己面对这处境，感觉是较前沉重，在过去数年间的处理方式，大抵是力求教与学二者的较大程度吻合，以教席上的讲授工作及责任支持学问思辩上的旨趣与诉求——以教学上的多元需要为基础，较能安立似乎是非主流的学术取径。例如我目前为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开设“文化社会学”，为研究生开设“社会学理论进阶”等课程，以及充任硕、博士论文导师，均可说是在大学建制中为我自己安立较稳定的思考与研讨平台，藉以为文化及理论课题作更深入探索。教学相长在目前已然是难得的遇合，而在当前香港的学术圈中，更已是适者生存式的策略。只是综括而言，虽然我自觉对文化及理论课题时有新的体会与发见，但仍未足以作较整全的综合提撕。反而是处身在这持续的过渡——或者亦可以说是“脱俗”（liminal）——的阶段，有时颇为感到是较能贴近及体会书中后半部分所求陈说的，（非）神圣化之境。故此对往后的“启蒙论述”发展又将如何，我是有着较大的期待与好奇，不过这些当已是后话了。

本书出版的具体安排，由童根兴与王玮二位编辑负责，感谢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与热忱。另外本书出版亦得到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在行政与资源上的助援，在这里一并致谢。

陈海文

2010年6月

目 录

序	金耀基	1
前言		1
内地版前言		1

序论 文化启蒙的课题

I. 中国启蒙的困惑		3
II. 启蒙课题与启蒙运动		19
III. 启蒙的传统与犹豫		28
i. 德国启蒙运动		28
ii. 法国启蒙运动		36
iii. 英国启蒙运动		41
iv. 小结		45
IV. 议程的开展		47
i. 中国启蒙的“繁复景观”		47
ii. 启蒙方法论		51

第一部 理念型

第一章 启蒙理念型

I. 引言		57
II. 启蒙理念型建构(1): 核心价值		61
i. 理念型方法论		61
ii. “自主性”		72

iii. “自觉性”	76
iv. “知识”	78
v. 结语	81
III. 启蒙理念型建构 (2): 取向与界线	82
i. 论启蒙界线	82
ii. 界线的探索	86
(a) “突破”	87
(b) “明晰”	88
(c) “控制”	89
(d) “秩序”	90
iii. 小结	91
IV. 结语	92
i. 回顾启蒙理念型	92
ii. 从理念型到理念人	93
第二章 “启蒙”与“觉悟”——理念型研究的开展	
I. 引言	96
II. 启蒙与志业	101
i. 论启蒙的非理性向度	101
ii. 从韦伯到启蒙	105
(a) 科学志业重探	105
(b) 科学志业与方法	108
(c) 政治志业重探	111
(d) 政治志业与伦理	115
III. 自我的重塑	119
i. “真人”的追求	119
(a) “成熟”	119
(b) “气魄”	121
(c) “化育”	122
(d) “恻隐”	124
ii. 诸神之战场	125

(a) 迫切的生活	125
(b) 自我的技艺	127
(c) 理性的超越	129
IV. 结语	130
i. 灵魂深处	130
ii. 人间条件	132
第二部 类型学	
第三章 启蒙类型学——破解启蒙心态 (1)	
I. 引言	137
II. 启蒙类型学：基本形式	143
III. 启蒙类型学：类型的界说 (1)	146
i. “道德—理性” 向度	151
(a) “理性主义”	152
(b) “科学”	164
(c) 小结	173
ii. “道德—非理性” 向度	175
(a) “气魄”	177
(b) “神圣”	185
第四章 启蒙类型学——破解启蒙心态 (2)	
I. 引言	195
II. 启蒙类型学：类型的界说 (2)	197
i. “非道德—理性” 向度	197
(a) “玩世主义”	198
(b) “个人主义”	205
ii. “非道德—非理性” 向度	214
(a) “感官主义”	215
(b) “权威主义”	225

iii. 结语	237
III. 启蒙课题的重构	237

中间考察

中间考察：中国启蒙事业

I. 论启蒙事业	245
II. 中国启蒙事业提纲	250
i. 历史轨迹	250
ii. 社会运动	252
iii. 社会神话	256
iv. 反传统	259
v. 民族主义	262
vi. 启蒙事业的黄昏	264
III. 儒学与启蒙：论“儒学第三期发展”	266
i. 中国文化/文化中国	266
ii. 唐君毅	269
(a) 天人之道、幽明之故	269
(b) 中国文化视野	273
(c) 人生与人文	275
(d) 人文、文化、悲剧	278
(e) 判教与還元	285
(f) 附论：牟宗三	290
iii. 杜维明	293
(a) 国际学坛	293
(b) “以边陲为中心”	301
(c) 灵根自植？	307
iv. 论析新儒学	313
IV. 结语	316